

上海老城厢平面格局的中尺度长期变迁探析

钟 翀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4)

〔提 要〕本文从城市历史形态学中康泽恩学派的研究思路出发, 以上海老城厢, 即上海旧县城平面格局的复原与长期演变考察为目的, 尝试整合利用近代早期的大比例城市实测地图、明中叶的城市古地图、明清方志中留存的宋元城市形态相关记录这3种资料, 重点考察中古以来上海城镇平面格局中的街道及街道系统、建成区地块集聚形态这两个主因素的具体演化历程, 进而获取若干不同时间断面较为清晰的复原方案, 并藉以追溯上海城镇形态的长期变迁历史。同时, 通过本案例的研究, 探讨江南乃至我国城市历史形态研究中特征要素的提取、长期变化的规律及变化速率等问题。

〔关键词〕上海老城厢 城镇平面格局 城市历史形态学 长期变迁研究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5)03-0056-15

〔收稿日期〕2015-02-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 41271154);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 14JJD770024)。

〔作者简介〕钟翀(1971—), 男,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

引 言

前近代以来, 江南地区绽放出了华丽的市镇文明, 其背景之一是长期以来当地中心城镇的发育与发达, 而在此过程中, 水乡中的众多县城无疑承担了地方经济的重要枢纽功能。不过, 由于史料的限制与个案考察的不足, 目前我们对此类县级城市形态演化的真实面貌与具体历程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实际研究中甚至还存在着不少的误解。

上海是我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 至今仍保存着不少近代早期的大比例尺实测地图, 这些地图反映了拆城填浜之前、较多保留传统县城形态的上海老城厢, 足以作为回溯研究的起点; 同时, 表现筑城前上海城市的古绘图, 则可上溯明嘉靖《上海县志》的修纂时期, 而明弘治以来方志中有关上海市镇早期形态的记载, 更可远征南宋末置镇与元初建县的时期。此种史料的特点, 对于开展该城平面格局的中尺度长期演变分析而言, 在兼顾史料批判的前提下应该可以有所阐发。

近年来, 以康泽恩为代表的西方城市历史形

态学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 该理论强调从形态学角度研究城镇平面格局的重要性, 认为历史悠久的古城景观之中, 城镇平面格局保留了其发展历程各阶段的残余特征, 是城镇形态空间发展历程的记录复合体, 因此, 基于演化的视角, 从现存平面格局回溯历史, 进而探究、揭示其潜在的发生史, 是城市史地研究中值得推荐的分析方法。在他的代表研究——安尼克案例中, 康泽恩以城镇平面格局中的三大要素, 即街道及其在街道系统中的布局、地块及其在街区中的集聚、建筑物的基底平面为主要分析因素, 凭借中世纪以来丰富的地图与地籍资料, 系统地提取该城平面构造中不同历史层次的各种形态基因类型, 从城市历史形态学的角度准确而清晰地展现了安尼克城长期演变进程。^①

① M. R. G. Conzen, Alnwick, Northumberland: A Study of Town — Plan Analysi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Publication 27, London: George Philip, 1960. 中文译本参见宋峰等译《城镇平面格局分析: 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年。

康泽恩的历史形态学方法为我国城市史地研究带来诸多启示，不过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由于东西方地图绘制传统与城市相关史料性质及留存状况的巨大差异，如何处理此种差异，有效运用康泽恩分析方法开展研究，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项课题。

就江南城市古旧地图与古文献的留存情况及质量而言，笔者以为，在缺乏系统的古地籍记录情况下，先期重点开展以街道及街道系统、地块及其在街区（或建成区）中的集聚形态考察为目的、1万至数万分之一比例尺的中尺度平面格局复原与分析，不失为一个比较现实的考虑。而在这样的研究中，根据江南传统古城的形态特征与宋元以来以方志为代表的文献史料特点（如水乡城镇中承担重要交通功能的河道，历史记录较为发达的衙署祠庙、桥梁等），适当调整平面格局的主因素为街巷、水系与桥梁（这两项相当于表达街道与街道系统），墙濠、衙署祠庙、坊厢（这三项主要表达城镇规模、建成区的地块及其集聚形态）来展开分析，应可获得明清时代若干时间断面上较为清晰的城镇平面格局，并据此溯及中古，延伸探索宋元时代的城市历史形态及其发展轨迹。

基于以上设想，本文以上海老城厢（即宋元建县前所谓“镇市”、元初建县至明嘉靖筑城前所谓“县市”、嘉靖筑城后直至近代的“县城”区域，现今通称“上海老城厢”）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该城在筑城前后、由镇升县前后等数个时间断面的中尺度图上复原与分析，尝试把握其长期变化历程，并藉以探索康泽恩方法之于我国传统城市历史形态学分析的资料适应性与研究适用性，讨论中古以来江南县级城市长期变化的规律性和方向性、各种形态要素的变化速率、乃至在此类县级城市聚落演化进程中的普遍性规律等问题。

一 前近代以来上海老城厢的平面格局

现今上海黄浦区的老城厢区域（图1），虽然历经民国初的拆城与填浜，近年来河南南路的贯通与拓宽等改造工程，但由中华路、人民路围绕的梨形环路仍然完整继承了旧县城的围郭格局，城内的街道系统也仍然大体维持着明嘉靖筑城之后的历史状况（此点详下节），其中的方浜中路、复兴东路、侯家路、凝和路、乔家路等街道，在位置、走向甚至曲度等细节上处处透露出老城厢乃至更早时代城内方浜、肇家浜、侯家浜、薛家浜四大水系及其支流的古老形态。在近代化之后的上海大都市之中，老城厢的平面格局与周边的近现代新建城区大相径庭，事实上该地已逐渐变质为景观迥异于周边街区、形态发展迟滞的嵌入型“城中城”，这座巨大的“城中城”是上海古城镇在其发展历程中各阶段残余构造的集合体，为探究其中蕴涵的潜在形成过程，则需要对其平面格局进行详细地分层复原与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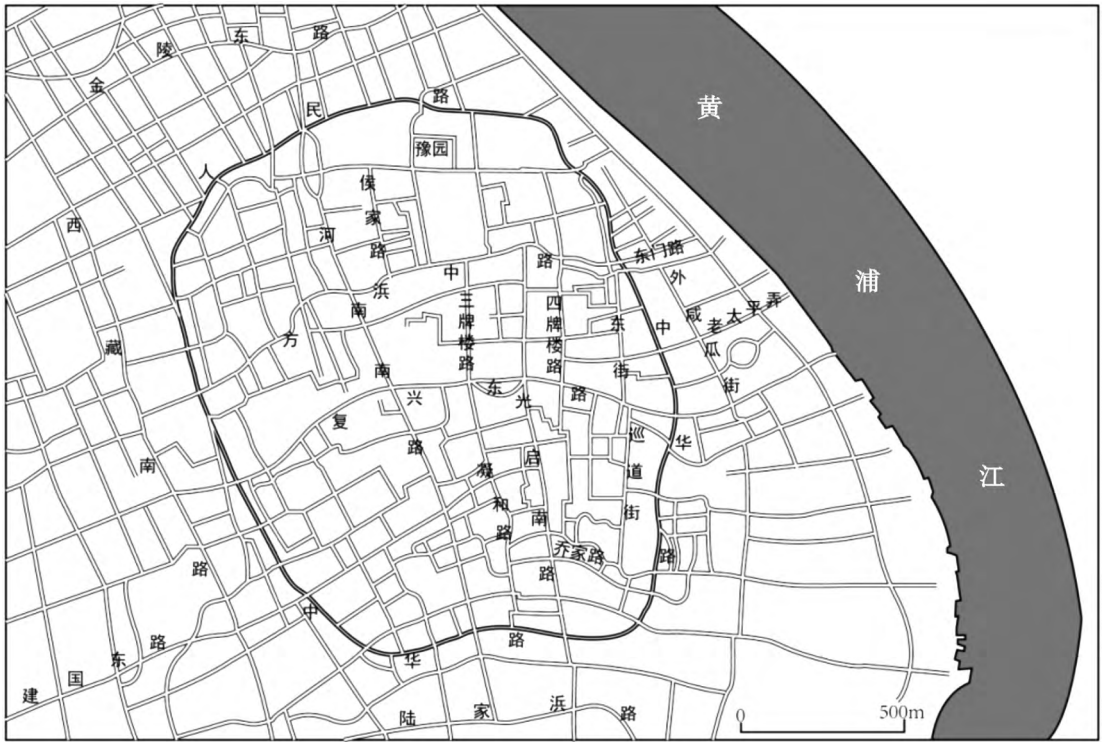


图1 现代上海老城厢及其周边街道系统图

上海是我国最先开展近代实测的城市之一，现存实测地图的历史可追溯到 1849 年。在表现 1915 年拆城前老城厢的实测图中，绘制较早如《上海县城及英法租界图》（约 1856—1858 年绘）、1862 年刊 City and Environs of Shanghai、1875 年刊《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以下简称 1875 年图）等图，绘制较详细的如 1888 年刊《上海城厢内外租界全图》、1910 年刊《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全图》等图，这些地图比例尺多在 1 万分之 1 左右，可为晚清老城厢复原图绘制以及中尺度的图上分析提供有力支持。而这其中的 1875 年图，是最早由国人绘制的大比例尺实测上海城市图，该图地物表现丰富，测制精确，其

中对墙濠以及街巷、官署祠庙、水系、桥梁等的表现都要大大超越此前各种上海图，可以说是上海乃至我国城市地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幅近代早期城市平面图^①。因此，本文选取 1875 年图为基础图，同时利用上述诸图以及同治《上海县志》（以下上海县志以“年号+志”、松江府志以“年号+府志”简称）等文献的相关记录加以修正，绘制晚清上海老城厢复原地图（图 2，以下简称光绪复原图）作为回溯考察的起点。

① 本文所涉近代上海地图的具体形态、测绘背景与收藏地等，详见拙作《近代上海早期城市地图谱系研究》，刊《史林》2013 年第 1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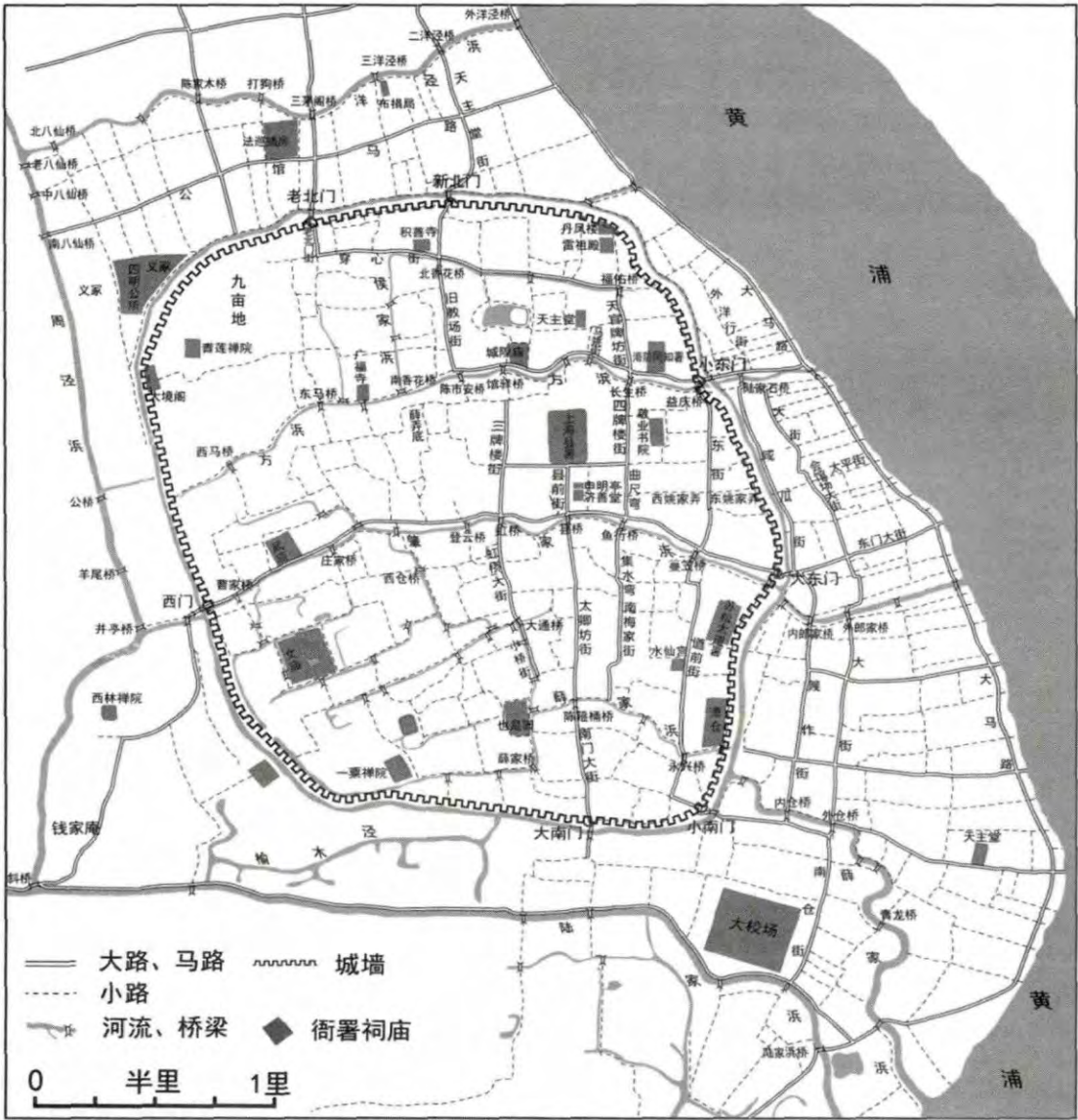


图 2 清光绪元年（1875）上海县城及其周边复原图

注：本图以 1875 年图为基础图绘制，由于 1875 年图上的黄浦江宽度等出现较大误差，城厢内外的一些支流河道也存在不少的遗漏，因此根据上述 1862 年刊 City and Environs of Shanghai、1910 年刊《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全图》等图加以修正与补充。

图 2 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晚清光绪初年 (1875) 这一时间断面上的老城厢平面格局, 图上可见当时的老城厢由半径一里有余、周长十多里的濠、郭所限定, 该围郭构造形成于明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并在此后成为上海县城平面格局上一个突出的特征。从街巷、河道的分布来看, 虽然老城厢内外号称“迷宫”, 但通过观察可知其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密集无序的迷路式布局。以主干道的组合来看, 在城内部分, 东西向的侯家浜、方浜、肇家浜、薛家浜这 4 条城内主要河道及其沿河街道, 与南北向的老北门街—穿心街—旧校场街—三牌楼街—虹桥大街—小桥街、县前街—太卿坊巷—南门大街、天官牌坊街—四牌坊街—曲尺弯—集水弯—南梅家街、东街—道前街, 在城厢东部形成四纵四横的栅格状街道网^①, 这一区域整体构成了老城厢的内核, 其平面格局呈现出传统水乡城镇的街巷特征, 显示其悠久的形成历史; 在城外部分, 自洋泾浜至薛家浜, 由联络沿江 40 余座码头而形成的东西向街巷, 与南北向的咸瓜街—簪作街、外洋行街至南仓街、滨江大马路也构成了显著的经纬交织的栅格状街道网。并且, 城厢内外的街道网络具有相似的肌理——如经向道路所反映的类似的间隔 (约 150 米), 纬向道路则大多可以透过东城门或东城墙而内外接续, 显示这些道路的形成亦较古老——即原先从城内放射出来的城市街区, 后被筑起的城墙强行打断这样的形成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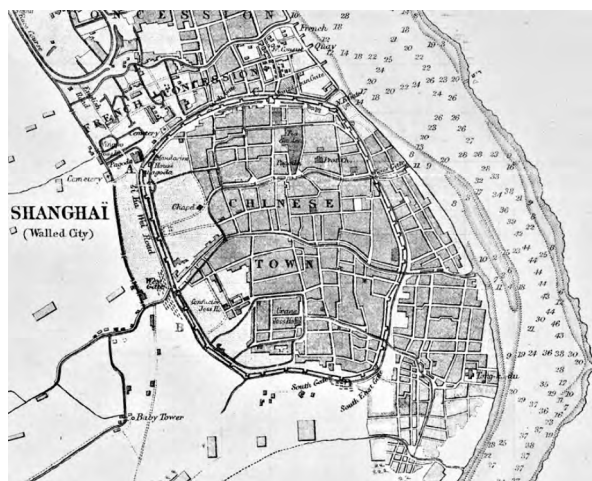


图 3 City and Environs of Shanghai (1862 年刊, 局部)

根据栅格状街道网可以大致推断晚清上海县城的街区分布格局, 但由于 1875 年图并未表现建成区的分布状况, 因此需要配合同时代的 1862 年刊 City and Environs of Shanghai (图 3)

或 1888 年刊《上海城厢内外租界全图》等加以明确。这些地图显示当时县城街区呈现出向东即滨江一线显著偏移的分布格局, 即在城墙与城濠所限隔的城内区域, 街区的分布则呈现东密西疏的格局, 而在东城外沿黄浦江地带, 则街巷密布, 出现了大片街区溢出城郭的现象。此种街道系统、街区分布格局在清乾嘉时期的文献中得以确认^②, 其中干线道路网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中叶筑城之前 (详本文第 2 节), 反映其对城市固有格局的继承。由此可知, 1843 年的开埠虽然促进了上海的繁荣, 但在光绪初年, 地块的租借、建成区的扩张主要发生在城外乡郊, 对县城传统格局的影响有限, 而从长期变迁来看, 对平面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无疑还是明嘉靖三十二年筑城这一事件, 下文将通过具体的复原分析来加以考察。

二 明嘉靖筑城前后的平面格局及其变化——以嘉靖《上海县市图》的复原分析为中心

上海的筑城始于明嘉靖倭乱之际, 嘉靖三十二年 (1553) 这一年之中, 倭寇多次袭扰上海, 焚掠县市, 鉴于时局的紧迫, 当年秋天, 经该县吏民日夜抢筑, 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仓促修筑起一道周长 5800 余米的城墙。江南的县级城市中, 此类筑城事件在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四年倭乱极盛期达到高潮, 但因资料所限, 一般很少能够深入了解类似的筑城活动对城市形态的具体变化与影响。幸运的是, 明嘉靖三年 (1524) 刊《上海县志》收录了筑城前绘制的一幅《上海县市图》, 该图的刊行十分接近县城的修筑年代, 因此本节将以此图为中心展开考察, 进一步分析筑城前后

^①关于图 2 中“大路”即城中干道的确定, 在 1875 年图上没有明确区分街巷的主次, 不过同治《上海县志》卷首《上海县城内外街巷图》中所绘街巷可见明显的路幅差异; 此外, 通过老城厢中城门与道路的关系可以确认城内的干道, 如大东门至西门间为肇家浜及沿河街道、小东门通方浜及沿河街道、大南门通县前街至南门大街、老北门通老北门街至小桥街、小南门通东街至道前街, 反映这些街道所承担的交通干线的作用。

^②如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刊《上海县志》、嘉庆十九年 (1814) 刊《上海县志》中的街巷记载、以及嘉庆志中的《县城图》, 均反映该城的道路系统至迟在乾嘉时期已经确立。

上海县城的平面格局变化。

1. 嘉靖《上海县市图》的绘制背景与研究价值

《上海县市图》载于嘉靖《上海县志》卷前(图4)。嘉靖《上海县志》，明郑洛书修，高企纂。现存嘉靖三年原刊本藏于上海博物馆。此书入清后即已稀见，今所存原刊本者惟上海博物馆藏本与日本静嘉堂文库守先阁藏本。此书长期为藏家所珍重，秘不示人，直至1932年经上海传真社影印收入《松江府属旧志二种》，始得世人广为知晓。

《上海县市图》名曰“县市”，系弘治志以来当地文献对上海县城的一贯称呼(直至嘉靖筑城后方有“县城”的叫法)。此图不注绘者与绘制年代，然图上的地物标注与书中记载高度一致，并不时可见此书主修者、当时上海县令郑洛书在嘉靖初年的活动遗迹^①，充分显示该图当作于县志编纂之际，是编纂者为配合县志而创作的、表现嘉靖初年上海县市实际面貌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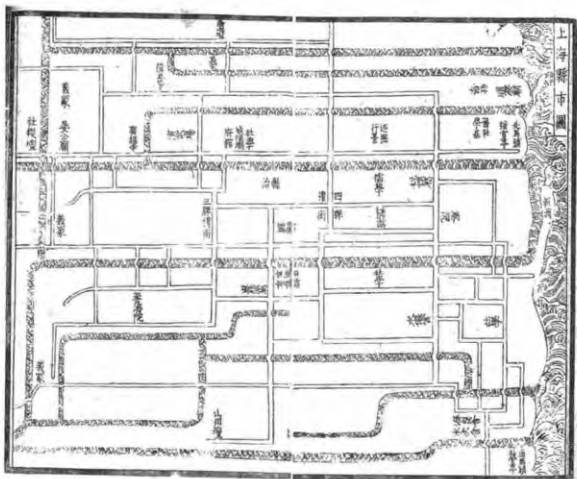


图4 明嘉靖《上海县市图》(1524年刊)

该图方向上北下南，描绘范围北起洋泾浜、南至陆家浜，西起周泾、东至黄浦江滨，按该志卷一所云“自杨泾至薛家浜，皆为县市”可知本图是以当时的上海县市为中心的城市地图(此处“杨泾”即洋泾浜)。图上文字标注的地物共39处，主要涉及县治、巡抚行台、察院、税课局、养济院、水次仓、济农仓、儒学、社学、社稷坛、邑厉坛、城隍庙、水仙宫、积善寺、广福寺、顺济庙、义冢等官署祠庙以及南、北两处马头(码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本图虽然仅有39处地物做了文字标注，但实际描绘地物要远在此数之上。例如，图上表现的众多街道、河

道、桥梁大多未注文字，但这些地物经过具体比定可知其绝非随意描绘，均为相当准确的写实表达(此点详下文)，加上只要充分利用这些地物的相互位置关系的表现，此图所能提供的信息量要远远超过同时代有关上海县市的其他文字记载。另外，从历史地图学角度来看，该图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平面图的方式形式，如街巷用双线、河流用双线填充波浪纹(波浪纹本身也可看作一种图符)加以表现，并且，各种地物的尺度以及相对位置关系也较为准确，与同时代方志中常见的仅有城墙与少数衙署设施的立面鸟瞰图式形象绘法相比，绘者运用了类似现代地图中路线图(常见的如地铁路线图等)的表现手法，既对当时实测较为困难的曲线、高差等进行了合理的简化处理，又不失准确性与功能性，其绘制理念与图式更接近近代制图技术，是中古以来在江南地区流传的一种比较先进的城市地图形式^②。因此可以说，本图不仅真实反映了1553年筑城前上海县市的全貌，而且内容丰富，测绘精确，十分有利于复原工作的开展。

2. 嘉靖《上海县市图》的地物比定与图上复原

以上特别说明《上海县市图》之于本文重点考察的街巷及街巷系统、街区及其集聚形态的研究价值，下面先通过对该图的河道、桥梁以及具体设施的系统比定，全面还原筑城前上海县市的街巷系统。

首先分析河道。虽然绘者未加文字标注，但根据黄浦江与县治、城隍庙、水仙宫、邑厉坛、水次仓等目前可以确定的主要官署祠庙的相对位

^①在此试举两例说明该图的即时性与准确性。如图中所注4处义冢，与嘉靖志卷三《义冢》中嘉靖元年知县郑洛书创建4处义冢的记载吻合；又如图中标注的位于县桥南岸的旌善亭，在后世县志中仅记其位于县桥北、县衙南的总铺附近，与此图不合，只有万历志中明确提及“旧在县桥南，嘉靖二十四年知县孙渭迁于总铺基上”的迁移变化(万历《上海县志》卷五)，正与此图所示位置一致，这些都证明了该图当作于嘉靖志编纂之际无疑。

^②在江南地区，此种绘制方式并非《上海县市图》首创，较早的如宋元方志中《淳熙严州续志》的《建德府内外城图》、《宝庆四明志》与《嘉定赤城志》所载明州与台州的城市平面图，以及石刻实物如南宋《平江图》等，均与此图的绘制方法接近，这可能跟该地区长期以来的城市图绘制传统与刻工群体有关。

置关系,便可简单判断方浜、肇家浜、薛家浜、陆家浜、洋泾浜、南侯家浜(即筑城后所称的“侯家浜”)、周泾这7条河道。而在洋泾浜与南侯家浜之间,可见到由洋泾浜分流并汇入黄浦江的一支河道,根据嘉靖志等的记载,此河应为北侯家浜^①。该河道在筑城之后的文献中均未见载,从位置关系推断,该河只可能是筑城时被利用改作北城濠了。图上另有薛家浜、陆家浜之间的一条小浜应是榆木泾,该河在嘉靖志中仅提及它位于包含县市的二十五保范围之内,不过清嘉庆志卷二《支水》中记载其“在陆家浜西北,分流大南门城濠,南一支由沙家石桥西出通东西上澳。”加之民国时期的大比例尺地图中尚可确认榆木泾的存在^②,由此推断该河原有南、北两支,北支(即《上海县市图》上表现的一支)也可能是筑城被利用为南城濠——即嘉庆志所云“大南门城濠”,而南支则一直延续至于近代。

确定河道之后,便可比定《上海县市图》描绘的40座桥梁,此处的关键史料是嘉靖志卷三《桥》中的以下一段文字(引文中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

县市三十八:曰五胜桥,今名新桥,曰郎家桥,曰抚安桥,俗呼东鳊鲫桥,曰灵济桥,俗呼西鳊鲫桥,曰阜民桥,俗呼县桥;曰望虹桥、登云桥、庄家桥、曹家桥、斜桥,已上并肇嘉浜;曰益庆桥、长生桥、长兴桥、陈士安桥、小马桥、马桥、晏公桥,已上并方浜;曰第一桥,曰福佑桥,俗呼黑桥,曰香花桥、南香花桥,已上并南侯家浜;曰众安桥、法华庵桥,已上并北侯家浜;曰洋泾桥、邑历坛桥、韩家桥,已上并洋泾;曰薛家浜桥、东仓桥、中仓桥、西仓桥、永兴桥,曰广济桥,俗呼陈箍桶桥,曰塌水桥,尼姑庵桥,已上并薛家浜;曰南仓桥,在仓南,水从山川坛前通榆木泾;曰井亭桥、杨皮桥、周泾桥,已上并周泾。

在《上海县市图》之中,以上嘉靖志所记当时县市的38座桥梁,其中粗黑字的21座桥梁,系笔者对照光绪复原图(图2)及同治志等记载确定的、直至1875年尚存的桥梁,此外,上述嘉靖志记载中的韩家桥当即近代之三茅阁桥^③、小马桥与马桥可推定为1875年图上的东、西马桥,东、中、西、南仓桥可根据水次仓与济农仓的位置(即图2中的“大校场”)来作推定,晏

公桥、邑历坛桥则可通过《上海县市图》上晏公庙、邑历坛的位置推定。根据在《上海县市图》上比定的这30座桥梁的位置,就能了解嘉靖志中的这一段桥梁记载,是按这些桥梁在各条河道的位置,以自西向东即自黄浦入口向县城西方上溯的顺序,准确无误地逐一予以记录的。利用这一记载特性,进一步比对《上海县市图》中各条河道上的桥梁,即可确定此图中绝大多数桥梁的名称。

以上嘉靖志中河道与桥梁等地物的明确的图、文对应关系,进一步印证了《上海县市图》的真实性,这些都为图中街道的比定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上海县市图》显示嘉靖初筑城前上海县市内复杂的道路网,不过图中有文字标注的只有三牌楼街、四牌楼街这两条,其他道路均需一一确认,为此收集嘉靖志以及同时期松江府志与上海县志中的街巷记录^④,作成表1。

①如嘉靖志卷三《桥》中在上海县市诸桥下注各桥所在河道,其中众安桥、法华庵桥下注“以上并北侯家浜”,此处按记载的顺序与该河的名称特征,可知其当在洋泾浜与南侯家浜之间。

②如童世亨编《实测上海城市租界分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国家图书馆藏)之第八图《上海县城及南市分图》中仍可见到“榆木泾”的南支,当即后来江阴街所在走向。

③嘉庆志卷六桥梁云“城濠之北为韩家桥,在三茅阁前”,近代上海的绘图如《上海县城全图》(日本山下和正等有藏)中有韩家桥,直对北岸三茅阁,南通老北门,可以确认即为近代之三茅阁桥。

④弘治《上海志》,明郭经修,唐锦纂,明弘治十七年(1504)刊本,1940年中华书局据天一阁弘治原刊本影印,该志系上海现存最早的县志;正德《松江府志》,明喻时等修,顾清纂,明正德七年(1512)刊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这两种方志与嘉靖志编纂年代相当接近,十分有利于本文有关嘉靖复原图的分析。

表 1 方志中所见明中期上海县市的街巷记录

文献名	弘治志卷三坊巷	正德府志卷九坊巷	嘉靖志卷三巷	嘉庆志卷六坊巷
记载	新衙巷：在县南 新路巷：在县西南 薛巷：在县西 康衢巷：在县南 梅家巷：在县东南	新衙巷：县南 新路巷：县西南 薛巷：县西，今名薛弄 康衢巷：并县南 梅家巷：县东南 宋家湾：四牌楼南街路屈曲通西（竹头十曼）笠桥 观澜亭巷	新衙巷、康衢巷：并县南 新路巷：县西南 薛巷：县西，今名薛弄 梅家巷：县东南，以梅宣使名 观澜亭巷：通北马头 宋家湾：在四牌楼南街 马园弄：在长生桥西北，相传以费氏畜马于此 姚家弄：通宋家湾 卜家弄：通中仓桥	新衙巷：旧志在县南，今按其地应是东西大街也，其东犹有名新弄者（钟案：万历志卷五《坊巷》“衙”作“街”，万历以前均作“新衙巷”） 新路巷：旧志在县西南，今按其地应是虹桥大街 薛巷：在画锦坊西，今呼薛弄底 康衢巷：旧志：在县南，今按其地应是县桥至南门大街也，延及城外犹有名康衢里者，徐文定别业在焉 梅家巷：在东唐家弄东，旧志云以梅宣使得名 宋家湾：在鱼行桥北，今呼曲尺湾 姚家弄：一在孙家弄北，为东弄，一在东街西，通宋家湾，为西弄观澜亭巷 卜家弄：通中仓桥弄

从表 1 看，明中期的弘治至嘉靖年间编纂的 3 种府县志，对于街巷的记录既显示出了较高的一致性，又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反映这些街巷应是文献编修同时期的客观存在。根据嘉庆志等后代方志的连续记载（参见表 1）并对照光绪复原图，则嘉靖志所载街巷在《上海县市图》中均可予以简单比定。不过，《上海县市图》还描绘了许多这 3 种明中期府县志并未记录的街巷，对于此类街巷，则可以根据它们在图中的相对位置关系，尤其是其与上文既已确定的河道、桥梁的相对位置关系加以比定。

在对《上海县市图》的复原作业中，尚需留意黄浦江县市段滩岸的淤涨变化。明永乐二年（1404）浚范家浜引黄浦东流入海之后，黄浦成为太湖水系入海主流，其河道逐渐冲宽^①，这是明前期黄浦江变迁之大势，而就上海县市段而言，文献记载显示自宋及明，该段江滨表现为北坍南涨、江流摆动加大的趋势。如明正德年间，肇家浜口的五胜桥、方浜口的回澜桥均沦入江中，使得原先位于方浜回澜桥之西的益庆桥（今小东门附近）成为浜口之桥^②；位于益庆桥北的税课司，在明初洪武二十五年还曾被潮水冲圯，不得不移建他处^③，这些都显示当时方浜以北江岸不断遭受侵蚀的事实；而同一时期，肇家浜口附近及以南江滨则出现淤涨，最突出的现象就是

肇家浜口的“新洲”这个边滩的出露与淤涨，该洲在元至正年间出露于黄浦江中，弘治年间延广至三十余亩，至迟在清中期已经并岸^④。将《上海县市图》所描绘的洋泾桥与洋泾浜口、薛家浜桥与薛家浜口的相对距离，与光绪复原图所绘区域加以对比，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自明嘉靖至清光绪以来该段江滨北坍南涨的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以光绪复原图为底图，剥离其中筑城后出现的地物，并添绘上述通过比定的地物信息，由此获得街巷系统较为明确的嘉靖初上海县市复原图（图 5，以下简称嘉靖复原图）。

①如褚绍唐《上海历史地理》中的《黄浦江的变迁》，第 57—68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正德府志卷十《桥梁》：“五胜桥，在肇嘉浜东，与下回澜，其地皆沦于黄浦，数年以来潮土寔长，几复旧规，桥当有作。回澜桥，益庆东。益庆桥，坊浜口，观澜亭西。”

③弘治志卷五“本县税课司”条：“在县东北，初益庆桥北，吴元年主簿王文显创，洪武二十五年潮水冲圯，至二十七年本局大使杨丑汉移建于此。”

④新洲见于《上海县市图》，嘉靖志卷一云“肇嘉之口有新洲，旧志文翬洲。”弘治志卷六《古迹》提及“文翬洲：元至正间黄浦中洲生，始寻丈，后延广三十余亩。”嘉庆志卷一《古迹》云：“文翬洲：今与浦岸相接，为民田矣。”



图5 明嘉靖三年(1524)上海县市复原图

注：本图以光绪复原图(图2)为底图绘制，为便于比较筑城前后变化，另以灰色梯形线圈出1553年修筑的城墙范围。图中4处义冢的名称根据嘉靖志卷三《义冢》及万历志卷五《丘墓》确定；地名加括弧者为推定名称。

3. 明嘉靖筑城前上海县市的街巷系统与城市规模

图5表现了明嘉靖初年上海县市的平面格局，尤其是确认了在筑城前上海县市中已经形成成熟的街巷系统这一点。不过，关于同时期上海县市中的街巷，根据《上海县市图》获得的这个复原方案与现存方志记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表一中弘治志记载的只有5条，正德府志7条，嘉靖志10条，而此后的万历志记载了11条，崇祯府志39条，康熙志25条，乾隆十五年志27条，乾隆五十九年志42条(含城厢内外)，嘉庆志63条(含城厢内外)。这些连续记录容易使人产生明清以来上海县城街区乃至城市规模快速扩张的错觉，既往的研究也往往依据单纯的街巷数量变化来推论上海城市化的进程^①。实际状

况是否如此？关于这一点，笔者以为还有必要结合文献、古地图，尤其是这些街巷记载的史料性质做慎重检讨。

从方志所见上述街巷记载的书记习惯，如街巷名称以及排列次序、注释的内容、各府县志街巷记录的因袭关系等来看，自弘治志以来的街巷记录应可分为3个记录群。

明弘治至万历的4种府县志构成了第一个记录群，这一群街巷记录数量最少，一般仅为个位

①如郑祖安《上海旧县城》，载《上海史研究》第77—9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傅林祥《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古旧地图反映》，载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第263—268页，(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等等。

数,并且所记街巷主要集中在县衙周边,而弘治志之后渐次增加的宋家弯、观澜亭巷、马园弄等几条街巷,或在空间上与既载的街巷相联络,或与码头、官仓、县中名人掌故有关,这几条街巷之所以被编者添加,主要因为它们都是在地理上有联系或历史上有掌故的特例。而同一时期在县市中实际存在的街巷,一定多于府县志中“街巷”门的记载^①,否则无法解释《上海县市图》所描绘的当时县市中大量“无名”街巷的存在。并且,透过上述街巷记录的排列次序、注释及因袭关系、还有这4种方志中有关坊、河道等记载的特征与继承关系,也可以推断该记录群至少是基于同一书记习惯的,甚至很可能还存在着共同的史料来源,比如源于当时编纂者可见的洪武《上海县志》、至正《续松江志》等更早期时期的当地志书,此点在下节分析上海早期形态之际还将进一步检讨。

从崇祯府志开始,关于上海县城的街巷记载突然出现了很大的数量飞跃,该志卷三《衢巷》记载上海城内街巷达38条之多,这应该不是上海城的街巷系统从万历十六年(1588)万历《上海县志》的编纂到崇祯三年(1630)编修崇祯《松江府志》不到半个世纪间发生的突变,而是崇祯府志的编者对包括上海在内的松江府属各府县城市进行一次统一标准重新调查的结果^②。而此后的康熙县志卷六《坊巷》收录25条,乾隆十五年志收录27条,虽然有所减少,但细绎两志的街巷记载亦可了解其记载并非源于两志编者的实际调查,而是对崇祯府志街巷记录选择性摘录所造成的,因此同样不能由此推断当时出现了整条街道或相关街区消亡这样的结论^③。因此,从崇祯府志至乾隆十五年县志的街巷记录可归为同一史源的1个记录群,该群的有效史料实际上只有崇祯府志的记载。

乾隆四十九年(1784)志、尤其是其后的嘉庆志以来,街巷记载又出现了成倍增长的趋势,这其中固然有城东沿黄浦码头一线建成区的蓬勃发展,但更多的原因也在于方志的调查工作更为细致、以及方志编纂者对街巷认识发生的变化。总而言之,明清方志“街巷”门的记载,并非反映上海县城自明中叶以来的线性发展,而需要在史料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审视,当然,这也从另一

角度证明了《上海县市图》中出现街巷系统应该当时的客观存在。

基于以上认识,利用嘉靖复原图(图5),就可以对嘉靖筑城前上海县市的道路系统、街区分布以及城市规模做出的清晰判断。

首先,根据嘉靖复原图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早在筑城之前的明嘉靖初年,上海县市之中已经出现对应于晚清时期的四纵四横栅格状干线路网,并且,当时该路网的经向道路还要一直延伸至洋泾浜,甚至超出了1553年所圈定城墙的范围。而根据此图所表现的道路系统,并结合嘉靖志记载当时属于县市之中的38座桥梁的分布,即可较为准确地勾勒出明中叶上海县市的大致范围:北起洋泾浜,南至薛家浜,西起周泾,东至黄浦江滨,对比光绪复原图,可知当时的城市规模与近代相差并不太多。事实上,这个判断与现在仅存的有关该时期上海县市规模的两条定性记述相吻合,嘉靖志中曾提及“自洋泾至薛家浜,皆为县市”^④,而刊行于上海筑城前的嘉靖《南畿志》,也曾指出当时的上海“居海之上洋,因海市为县,无城郭,惟有二门(南马头、北马

①在此试举两例,如嘉靖志的《上海县市图》中可见之三牌楼街、四牌楼街,根据后来崇祯府志卷三《衢巷》的记载,是县城内仅有的两处“日中为市”的重要繁华街,但却未被记录在嘉靖志卷三《巷》专辟的街巷栏之中;又如正德府志卷十“税课局”条提及“在县市东街,吴元年建于益庆桥北,洪武二十七年迁于此”,此处的东街亦未见载于正德府志卷九《坊巷》这一专记街巷的栏目,由此可知明中期方志之中街巷记载的任意性与非系统性,当然,这种资料的性格也是有缘故的(详下文)。

②崇祯府志卷三《衢巷》之中,首先将城内道路详细区分为里、街、巷、衙、湾、汇等6类并分别加以明确的定义,反映该志编修之时在城内道路的记载上进行了创新性的规定、调查与整理。而从该志祠庙等其他记载上,也可看出编者所具有的独立调查的志向。

③现存反映明末清初上海县城生活的笔记、日记类史料,如叶梦珠的《阅世编》(中华书局《上海掌故丛书》本)、姚廷遴的《历年记》(《清代日记汇抄》所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其中有大量关于城内街巷及其他地物的记载,这些记载表明上海县城的街巷系统相当稳定,与之相关的居民区也并未发生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变化。

④嘉靖志卷一《山水》之“黄浦”条。

头),所聚周四里,环县以水为险”^①。此外,成书于1504年的弘治志,在卷五《津梁》中曾提及当时县市内仅有的两个渡口——“薛家浜渡,在县市东南;方浜渡,在县市东北”,这也等于是间接指示了当时的县市范围,说明至迟在16世纪初明弘治之际,上海这座县城已经相当接近清末光绪时期的城市规模了。

其次,嘉靖复原图呈现的街巷、桥梁集中分布于三牌楼街至东街之间的现象,亦可说明晚清地图上所见东密西疏的街区分布格局由来已久。这一结论还可从《嘉靖县市图》(图4)中得到印证,将之与基于实测图的嘉靖复原图(图5)对比,该图自三牌楼街以西部分,其比例被迅速压缩,这一现象与三牌楼街以东部分相对精确的比例表现形成显著差异,此种我国古代城市地图常见的局部放大、突出表现建成区部分的非等比例绘图方式,也间接反映了明嘉靖初上海县市东密西疏的格局已然成型。

再者,关于筑城前后上海城市平面格局的变化,现存与之相关的主要文献如《顾从礼奏请筑城疏》(崇祯府志卷十九、同治志卷二等所载)、潘恩《郡侯方双江城上海序》(《潘笠江先生集》卷八所载)等均未触及。不过,通过光绪与嘉靖复原图的比较,就可以系统地观察到筑城后的整体格局变化及诸多深刻影响。比如,筑城所造成的路网、河网的打断现象,还有街区集聚形态上所反映的疏密关系的执着现象,其实都反映了筑城活动之于江南城镇平面格局各种要素的变与不变、易变与难变的内生逻辑。此外,就上海城的城、濠两要素来看,近圆形的围郭构造固然与短时间的仓促筑城密切相关——即以最短周长围护最大城内面积这一原则有关,而在城墙细部走向上所表现的平滑自然却又富于凹凸变化的线型,正反映了当时随形就势的修筑规划方案——即在具体工程中采取以最小成本推进涉及墙濠修筑的房地产拆迁工程实施这一规律有关^②。至于上文考证的北侯家浜、榆木泾北支的突然消失,通过嘉靖、光绪复原图的对比,亦可确认其显然是筑城时被利用作为城濠了,类似利用原有河道筑城,亦可作为江南水乡筑城的一般规律而应用于其他城市的水系复原分析中。

三 宋元时期上海城镇平面格局拟测

以上分析明确了上海县城在16世纪的明代中叶,已然形成具有相当规模、较为成熟的江南城市,这个结论也预示着该城的发展史仍有进一步上溯的空间。上海在宋末建镇、元初置县,根据元大德六年(1302)上海县教谕唐时措的描述,宋元之际的上海,“襟海带江,舟车凑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毗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③这段文字虽不免溢美之辞,但其中有关市舶、榷场、酒库以及官署祠庙等陈述应是实情,而毗廛贾肆鳞次栉比也说明当时的上海确已发育成为长江三角洲末端的一个繁华市镇。那么,是否可以对当时的城镇平面格局作出定量的图上复原呢?

关于早期上海聚落的历史复原图,此前研究常常援引嘉庆志所载《上海未筑城古迹图》,该

^①嘉靖《南畿志》卷十六《城社·上海县》,明闻人诠修、陈沂纂,明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这段引文中括弧内的“南马头、北马头”为原文的小字夹注。案:以嘉靖《上海县市图》所示南、北码头的距离核之,则该条提及上海县市“所聚周四里”,当以“所聚径四里”为妥。方志中偶见“周”、“径”混淆的错误,例如《至正无锡志》卷一提及罗城周四里三十七步,子城周一百三十步,均为“径”之误,详钟翀、陈吉《无锡古城郭的空间构型与长期变迁》,刊《九州》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②这在当地文献的零星记录中也是有所反映的,笔者试举两例。如前揭《阅世编》卷十《居第二·子部》提及筑城对原有建筑的影响:“尊德堂,在城南之东偏,乃赵氏之先者为仪宾所建,此时尚未有城门,宇堂前犹在城外也。嘉靖中以倭警筑城,故彻去前堂以外,而移墙门于内,故门内为中堂。……今城下门宇巍然者,乃堂之东偏佐室也。”又如,《西城张氏宗谱》(上海图书馆藏1928年修活字本)卷一《明贡士张致斋先生行状》提及筑城对墓地的影响:“及癸丑、甲寅,岛夷猖獗,载道流移。……会路筑城与祖塋相直,公曲为保全。”该谱卷四提及:“西楼公讳庆,……卒于弘治十六年,……墓邑西运粮河南原。后岛夷乱,有司度地筑城,城经墓道,公孙泮力请于台使者,得移其界稍折而西,百雉环抱,为地脉增胜焉。”

^③弘治志卷五《公署》“县治”条所载《唐时措记》。该记系唐时措在上海置县11年之时所撰、并勒石碑树于县署内。

图意欲还原上海筑城之前的面貌，图中对宋元时期的市舶司等设施均有标注，因此常被视为上海元初建县前城市格局考察的依据。不过笔者分析之后发现，该图实源于清乾隆末年褚华所辑《沪城备考》一书，而褚华应未见到弘治志等当地早期志书，以致图中历史层次紊乱、地物表现多有错讹，不能作为宋元上海镇复原之用^①。除此图之外，现存上海县志之最早者为弘治志，而本地县志的创修也要迟至明初洪武年间，因此若欲复原此前宋元时代的平面格局，确实存在史料匮乏的困难。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两个方法，一是精查现存明代府县志中收录的早期相关记载，二是利用上节获得的嘉靖复原图，根据康泽恩理论中的形态发生原理，尽可能地辨别、提取其中的早期形态框架与形态基因。下面逐一加以考察。

有关宋末上海镇市及元初上海县市内部格局的关键史料主要见于现存方志的坊巷类记载之中，而中古时代的“坊”在江南的城市中多为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的空间实体街区（笔者暂将此类坊简称“实体坊”），这与本文所追求“地块及其在街区中的集聚形态”的考察目的一致，因此很有必要对此类记载所涉及的宋至明时期上海镇市及县市中“坊”的演变做一梳理。

关于宋元时期上海的坊，现存最早记载见于弘治志卷二《山川志·坊巷》，其中较为系统地收录了宋元的11个坊及明初的9个坊，并指明了各坊的位置所在：

肇嘉坊在肇嘉桥北，拱辰坊在肇嘉坊北，文昌坊在福会坊右，福会坊在坊浜北，致民坊在长生桥北，永安坊在长生桥北投西，福谦坊在南侯浜桥南，泳飞坊在县北门杨泾，联桂坊在泳飞桥北投西，宝华坊与联桂坊对，登津坊在第一桥东。^②

而后刊行的正德府志卷九《坊巷》对上海城中坊的记载更为详细，除了提到弘治志的上述11个宋元坊之外，还记录了元末至正以来上海全县所建的73个坊，从坊名及其位置关系等来推测，这些坊的记载在文本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抄录了11个宋元坊之后，元末以来坊的记载均按建坊年代先后排列，二是宋元坊与元末以来的坊显然存在本质区别，即宋元坊应为实体坊，而明成化以后所有记载的坊显然都是旌表功能的单座牌坊。^③作为上述推测的一个有力支持证

据，此后的嘉靖志更为明确地区分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坊——宋元坊被直接收入该志卷六《古迹》之中（仅漏载了肇嘉坊），并指出这些坊“元末国初有司更建不常，特以其废而类于此”，说明此类实体坊在元末明初已发生较大的变化；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嘉靖志卷三《坊》又记载了明代所建的61座坊，这61坊从记载内容看，除了元末至正至明初洪武数个坊的性质有所存疑之外，其他均可确定为旌表的牌坊。有关宋元坊的记载，在之后的万历志中被进一步弱化，该志卷五《坊巷》仅抄录了11个宋元坊的名称，而省略了此前弘治、正德、嘉靖诸志中关于这些坊的具体位置等描述，并以小字注云“以上宋元时建，俱废”^④。由此可见，上海的实体坊当设置于宋元之时，到元末明初之际渐至罢废，取而代之的是旌表牌坊的不断增多，到明成化之后坊已经不再用以划分实际的城市空间。^⑤

从史料来源的角度分析，弘治志、正德府志等现存明前期方志中出现的有关上海宋元坊的记载，很可能是源于宋元时期的当地方志，反映的是宋末上海镇及元初建县之初上海城中实体坊的

①参见褚华辑《沪城备考》卷首《上海未筑城古迹图》，1936年中华书局《上海掌故丛书》本。此图错谬较多，如对照嘉靖志的《上海县市图》及本文考证，南侯家浜在筑城前系独流入黄浦，而图上却表现为筑城后汇入方浜的形态，又如泳飞桥当在洋泾浜之上，此图却绘在方浜。对明筑城之前的地物表现尚且如此，上溯宋元则更不可求。

②其中“文昌坊”，原书作“文昌桥”，显误，今据正德《松江府志》等改。

③正德府志卷九《坊巷》云：“邑聚民以坊巷而表其贤者，先王疆理旌别之政存焉，其余因事而名，盖有不尽同者，各随其实而著之，不可考者存其名而已。”反映了当时实体坊作为历史现象的状况。此外，就上海的案例而言，元末明初城中的坊可能既有实体坊，也开始出现单体的牌坊，表现为由实体坊向牌坊过渡的倾向，相关详细考证尚待别作一文再述。

④万历《上海县志》，明颜洪范修，张之象纂，明万历十六年（1588）刊本，上海图书馆藏，该志亦属上海县志之稀见本。

⑤嘉靖志卷二《户役》指出“元：保里多仍宋制，保有正、有长，里有正、有主首，在邑居者为坊正。”又同书卷八所载元统二年（1334）《上海县坊正助役义田记》一文，均表明至迟在元中后期，上海县城中的坊仍然维持着系统的基层行政管理职能。

建置实况。

比如，在弘治、正德两志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弘治志的“福会坊，在坊浜北”这条记载中用了“坊浜”这个地名词，考虑到在弘治志中凡提及方浜均用“方浜”二字（如卷二《山川志·水类》记录“方浜，在二十五保”，又如卷五《津梁》云“方浜渡，在县市东北”等），仅此处写作“坊浜”，而这恰与正德府志中“坊浜”的记载习惯相同，显示与之相关的记载可能是两志编者抄录了之前同一种文献的结果，从现存江南方志的内容来看，这种明志抄录宋元志的现象极为普遍。而按照正德府志卷首“参据旧志并引用诸书”条提及当时可见宋《绍熙云间志》、元《大德松江郡志》、《至正续松江志》等府志以及洪武《上海县志》及弘治《上海志》，而弘治志中又有明确引用《至正续松江志》的条文，因此推断这 11 个宋元坊的记载可能是源于现在已佚的宋元或明初府县志。

不过，虽然现存府县志所载明成化以来上海县市中的坊均为牌坊，但还有唯一例外的记录——“安抚司酒库，在县市坊浜北福会坊内”（载于正德府志卷十一、嘉靖志卷三等），鉴于酒库系占据相当面积的地块，此记录或能反映福会坊作为一个实体坊仍见存于明中叶的上海县城之中，不过由于该酒库在元代已改作税司（见于正德府志卷十“税课司”条），这条描述历史遗迹的记载也应该是抄录更早时期方志的结果，所以，“福会坊”这一宋元实体坊出现在明中期以降方志中的现象，可以单纯以方志编者史料整理不彻底来作解释，并不能据此孤立记载说明上海县城在明中叶之后仍存在实体坊，而恰恰只能起到反证该坊在宋元时代作为实体坊存在的作用。

以上推断还可从南宋上海镇市舶分司提举董楷所作《受福亭记》一文的记载中得以印证，此文提及咸淳七年（1271）上海镇的若干坊市建置与分布情况^①。

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乃痛节浮费，市木于海舟，陶埴于江滨。自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建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闾阖之所；其东旧有桥，已圯，巨涛侵啮且迫，建桥对峙，曰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为

文昌宫，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尽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尽致民坊，市民议徙神祠为改建曰福谦桥。由福谦趋齐昌，乃臣子于兹颂祝万寿，广承滋液，施及群动，改建桥曰泳飞桥。

这段文字提及的拱辰、福会、文昌、致民四坊，其坊名及相对位置关系与弘治等志所记吻合，由此笔者汇集上述两段史料中出现的肇嘉桥、坊浜、舶司等 15 处地物记录，根据本文的嘉靖复原图可直接确定坊浜、北门杨泾、长生桥、益庆桥、第一桥等 5 处，再根据弘治志等文献可确定上海酒库、文昌宫 2 处的位置^②，并以此 7 处地物为依据，通过相对位置的比对，获得宋末至元中叶上海镇市及县市的平面格局复原示意图（图 6，以下简称宋元复原图）。从此图上，可以观察到宋元时期上海城市形态的如下一些特点。

① 弘治志卷五《堂宇》所载。

② 文昌宫，按嘉靖志卷三《儒学》载：“在县东益庆桥南，初在长生桥东北，宋咸淳中士人唐时措兄弟即其地立文昌祠，请于舶司董楷作古修堂于后为讲肄之所。”上海酒库，按正德府志卷十一“安抚司酒库”条云：“在县市坊浜北福会坊内，宋建元改为税司。”又卷十“税课局”条：“在县市东街，吴元年建于益庆桥北，洪武二十七年迁于此。”因此推知，宋时文昌宫当在长生桥东北，酒库在益庆桥正北东街口。



图6 宋末至元中叶上海镇市及县市复原图

首先，宋末元初的近半个世纪，是上海聚落发展又一重要转折型期，从南宋末年在上海镇置市舶司，到元初至元十四年（1277）升为市舶司，再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立县，至大德二年（1298）撤上海市舶司，随即将县衙由宋元镇署所在地（元松江总场附近，即明代东察院、清初黄浦营，今小东门外咸瓜街太平街附近）迁旧市舶司署（即嘉靖、光绪复原图上的县治所在地）^①。在沿海口岸经贸的推动下，上海这一市镇行政地位显著上升，这必然引发其城镇平面格局的诸多变化。

对比嘉靖复原图与宋元复原图，可以观察到在两个多世纪里上海城镇平面格局的重大变化。宋元复原图上所显示的上海城镇，概括而言其表现应是一座较为典型的河埠型市镇，这一时期的11个坊全部建在由洋泾浜到肇家浜之间的濒浦

或近浦地域，尤以自长生桥至益庆桥的跨方浜南北区域最为密集，而其城市核当在益庆桥南、当时的榷场与舶司以北一带（今小东门内外地带），上述董楷文中提到该处系“一市阘阘之所”，也证明了这一点。从此判读结论出发，结合顺济庙建于南侯家浜口、榷场建于方浜益庆桥南等海洋贸易标志性场所的实际位置，则可推论宋末元初上海镇的纬向主街当是方浜及沿河街路、经向主街应该就是东街及其向北跨益庆桥、南侯浜桥、泳飞桥的街道。与明嘉靖前后的平面格局相比，主干道系统存在着一些明显差异，即宋元时期呈现出更偏东北分布，即更贴近濒临黄浦地带的形

①关于宋元时期上海镇、县的变化历史，最有力的史料是本节开篇提及的弘治志卷五《公署》“县治”条所收《唐时措记》一文，是文明确记载了元初上海由镇升县、市舶司的设置与撤并、县衙的搬迁等的情况。

态特点,该平面格局表现出早期上海聚落形态上更为突出的河埠型市镇性格。

以上推论还可从早期方志记载的城内宋元寺观的分布、元明之际城内建坊的空间推移上得到支持。

本节开篇所引元大德时唐时措文提及宋元之际上海有“佛宫仙馆”,在嘉靖志卷六《古迹·祠庙寺观》具体记载了7处在宋元上海“镇市”或元代上海“县市”内的古寺观:“义勇武安王庙,在今益庆桥北;有五显庙,在今长生桥西;有岳庙,在今县治东南,俱在旧上海镇市。……三皇庙,在县东北,元建,以为医学之祖。帝师庙,在县北,元至治间诏立,崇奉帝师板的建巴思八八合失。……南圣妃子宫,顺济庙南;……齐昌寺,旧上海镇市,由福谦桥入。”加上嘉靖志卷三记载的南宋所建积善寺与顺济庙,以及万历志卷五记载的五代所建广福寺,这些10处宋元古寺观均分布在上述推论的宋元建成区范围之内(图6)。

又以弘治志卷二《坊巷》,嘉靖志卷六《古迹·坊》记载元末明初县市内所立10坊分布来看,元末至正初年所立阜民、迎恩2坊在县衙南,明初洪武四年所立敷教、澄清2坊在县衙东,洪武八年所立迎恩坊在县南,崇礼等4坊在县衙东十字街口(嘉靖志云“俗呼四牌楼”,即四牌楼街的来历),洪武三十年立登科坊在薛巷口。可见其分布均是围绕元大德二年搬迁的新县治、也就是方浜中段至肇家浜一带推展的,而明中叶以后的繁华街——四牌楼街、三牌楼街,从其由来与命名看,前者最早也要到明初洪武八年之后才出现,后者则更是晚至成化年间方才形成^①。

那么,当时肇家浜北的大德二年后新县治所在区域(即明清县城中心区域)情况如何?从目前掌握的材料与上文的分析来看,元中期之前的11个实体坊之中,只有肇嘉坊与肇家浜有所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该地块的开发相对较为晚近。

而从道路系统来分析,明弘治至万历府县志中的街巷记录群(详表1及本文第二节)之中,除观澜亭巷外均落在元大德二年的新县衙及其周边以肇家浜中段一带的区域之内。值得注意的是

该街巷记录群中的新衙巷、新路巷、康衢巷这三条主干道,其路名均赋予“新”字或以雅化形式的“康衢”来命名,这个“新”字显然是针对元大德新迁县署而言之“新”(尤其是新衙巷这一路名,直接证明了其出现当在大德二年新县治搬迁之后),而从时间上看,这个街巷记录群距离其最早的现存文献载体——弘治志也有一个世纪以上了,故而推测该记录群当非弘治志编者首创,而是转录此前明初洪武《上海县志》或元至正、大德时期所修的《松江府志》等更早时期志书所致,反映的是元大德二年新县治搬迁后不久的上海城市状况。因此可以说,从街道系统来看,相对于宋末既已发达的滨江建成区,以元代新县署、肇家浜中段为中心的地带,其道路开辟应该是相对较为晚近的,该地块的开发大约在上海立县之后的元代后半叶至明初渐次展开,引起这一平面格局上由江滨向纵深延伸的原因,有可能是上述黄浦江局部冲淤平衡变化而引起江滩岸线的改变,更可能是这一时期上海这座城市本身的成长与繁荣。

结 语

本文研究表明,从长期形态演变的角度来看,上海作为城镇的历史应该可以大致区分为早期的北宋至元代建县初的河埠型市镇(约11世纪~14世纪中期)、元末至明嘉靖筑城前的环河型水乡县市阶段(约14世纪中期~1553年)、明嘉靖筑城至民国初拆城的老城厢阶段(1553~1915年)、近代化之后至现代的嵌入型“城中城”阶段(1915年至今)这4个时期。通过对街道与街道系统、街区及其集聚形态发育历程的追溯,就可以清晰显现各个阶段的平面格局变化中某些特定的功能性地块、坊与厢、河道与桥梁的演化方向与变化速率等,并对行政建置变化、筑城、近代化开发对江南经济型市镇形态的实际

^①在嘉靖《上海县市图》中,道路标注文字者仅见三牌楼街、四牌楼街;而此后的崇祯府志卷三《衢巷》记载这两条街是当时上海县城内仅有的两处“日中为市”的重要繁华街。三牌楼街的三座牌坊(即牌楼),系明天顺、成化间刘玠、刘琛所立,详见嘉庆志卷六《坊巷》、卷十《选举》、卷十一《封赠》。

影响做出评价。

由于年代久远、地物变化复杂，本文基于城镇平面格局分析所揭示的结果，在直观上看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不过，就笔者对近现代江南市镇形态演化的共时性审视而言，以上 4 阶段的生长历程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在由中心城市（如沪、宁、杭）、区域次中心城市（如苏、锡、甬等）、

一般县城以及诸多市镇所构成的江南城镇网络体系之中，必然发育形成与各自所处层级、地位相适应的平面格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上海城镇平面格局长期变迁中所观察到的长期变迁历程，不仅具有典型个案价值，也为今后系统研究江南城市历史形态演化进程与规律积累了素材。

Long-term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Old Shanghai Town: A Meso-scale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

Zhong Cho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Urban Cul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a long-term changes of old Shanghai Town (上海老城厢). Based upon a meso-scale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 which focuses on 2 complexes of plan elements of the town: (i) streets and their arrangement in a street-system, (ii) plots named Fang (坊) and their aggregation in street-blocks, and examinations into the early-modern Shanghai maps, ancient Shanghai maps in Min dynasty, and the local records about town morphology in Song and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hronological survey of growth process of the old Shanghai town. It further addresses issues of the characteristic plan elements of towns and cities in Jiang-nan region (江南地区), and developmental phases of the Chinatown.

Key words: The Old Shanghai Town; Town-plan; Historical Urban Morphology; Long-term Changes Research